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成果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英汉语篇下指认知功能研究

*Cataphor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arrative
Discourse: A Cognitive-Functional Account*

余泽超 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成果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Cataphor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arrative Discourse:
A Cognitive-functional Account**

英汉语篇下指认知功能研究

余泽超 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序

本书是余泽超博士基于他在 2007 年撰写通过的博士论文而完成的一部关于英汉语篇下指的专著。

下指 (cataphora, 或译“预指”) 又称逆回指 (backwards anaphora), 是广义的回指 (anaphora) 中的一个类型。语言学中讨论得最多的回指现象是指两个名词性词语具有相同的指称值或范围 (Reinhart, 1999: 20)。也就是说, 回指是由语篇中的两个指称词语 (即回指语和先行语) 表达的一种同指关系。下指是回指的一种有标记的形式, 因为在下指中, 指代形式 (proform) 在语篇中先出现, 而表示指称对象的那个名词性词语后出现, 与无标记的回指正好相反。因此, 下指中涉及的两个指称词语或许称为“下指语”和“后行语”更为确切。

Reinhart (同上) 认为, 代词回指的阐释可以采用两个不同的程序策略: 1) 约束法: 即把代词看成是一个受约变量 (bound variable), 其指称值受 λ -算子 (λ -operator) 的约束。例如, 如果我们将下面的 (1b) 看成是一个孤立的句子, 那么句中的 he 通常可以理解为与 Mark 同指, 其逻辑表达式可表述为 (2a)。2) 同等赋值法, 即把代词视为一个自由变量, 其指称值由语篇存储库中的一个名词短语指派, 被赋予一个同等的指称值。例如, 如果我们将 (1b) 看成是上文 (1a) 的接续, 那么 he 可以理解为与 John 同指, 其逻辑表达式可表述为 (2b)。也就是说, 在语篇理解的过程中, 当我们处理到 (1b) 中的 he 时, 在我们的语篇

存储库中已经存有一个登录项目 John, 我们可以赋予 he 一个与 John 同等的指称值。

- (1) a. John didn't show up today.
 b. Mark thinks he's got the flu.
- (2) a. Mark ($\lambda x(x \text{ thinks } x \text{ has got the flu})$)
 b. Mark ($\lambda x(x \text{ thinks } z \text{ has got the flu}) \ \& \ z = \text{John}$)

这两种回指对象的确认方法不仅适用于代词回指, 也可推广到所有的名词短语回指; 不仅可以运用于无标记回指, 还可以运用于有标记回指, 即下指。约束法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句内回指问题, 因而主要是形式句法学和形式语义学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 而同等赋值法主要是用于处理语篇回指, 因而主要是语篇分析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

在形式语法的管约 (Government and Binding) 理论框架中, 对“约束”的规定主要是采用成分统领“(c-command,)”这一概念。例如, 在下面的(3)中

- (3) a. Near him_i, John_i noticed a trapdoor.
 b. *Near John_i, he_i noticed a trapdoor.
 c. John_i loves his_i mother.
 d. *He_i loves John_i's mother.

(3a)和(3c)中的 John 成分统领 him 和 his, 这两个代词都受 John 的约束, 因此(3a)中的 him 可以下指 John, (3c)中的 his 可以回指 John, 两句都是合法的句子。而在(3b)和(3d)中, John 都不能成分统领 he, 也就是说这两句中的代词都不受 John 的约束, 因此(3b)中的 he 不可以回指 John, (3d)中的 he 也不可以下指 John。如果两句中的代词与 John 同指(即都具有相同的下标)的话, 那么都不是合法的英语句子。

形式语法对“约束”的上述规定, 主要是基于句子构成分

在句法结构上的显著性。也就是说,被统领的句子成分的显著度必须低于其统领成分。而在 van Hoek (1997) 以 Langacker (1987, 1991) 的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为理论框架提出的回指阐释理论中,句子构成分在句法结构上的显著性被认知上的显著性所取代。她认为,要解释语言中的回指现象,我们只需一些以语义为基础的概念,而不必借助一些描述句法结构关系的概念,如生成语法中的成分统领(van Hoek, 1997: ix)。而且,以语义为基础的回指规约原则也不需要再在语法中另行独立列出,而是由语言的语义组织自然属性,特别是名词性词语的语义属性所决定的。句内回指和语篇回指的规约原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作回指判断时,存在一些在鲜明性和可靠性方面的程度差别(同上: 218)。她从认知语法的基本观点出发,提出了一套回指规约机制,为如何确定代词的指称对象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是概念参照点(conceptual reference point)和领地(dominion)。

在 Langacker (1991) 的认知语法体系中,一个概念结构(conceptual structure)包含一组感知的概念实体。认知主体通常先感知某个实体,然后再通过这个实体来对概念结构中的其他实体进行定位或解释。这个首先感知的实体被称为概念参照点(简称参照点),而这个概念结构称为这个参照点的领地。如果我们用这两个概念来解释回指确认问题,那么我们面临的任务便是需要确定领地中的哪些实体可以或通常与参照点同指,哪些不能与参照点同指。要完成这个任务, van Hoek (1997: 58) 认为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1) 促使认知主体选择某个实体为参照点的一般因素有哪些? 2) 哪些具体的参照点/领地布局形式(configurations)在英语的常规结构图式中确立固定下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她(同上:58-59)列出了如下三个一般因素:1)显著性,即X比Y更有可能被选为参照点,如果X在包含Y的语境中具有显著性;2)线性语序,即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X比Y更有可能被选为参照点,如果X比Y先被感知;3)概念联系性,即两个名词性词语之间的概念(语义)联系的密切程度,这是由两者参与的结构关系决定的。参照点的领地由概念联系性和线性语序共同确定。线性语序对参照点选择的影响较弱,不能抵消显著性和概念联系性的共同影响。

关于第二个问题,van Hoek认为,认知语法的语义结构分析提供了确定显著性和概念联系性的方法,从而可以确定英语结构所反映的参照点/领地布局。显著性可以根据形象/基底(profile/base)的区别和图形/背景组合(figure/ground alignment)来确定。比如,主语是小句中的图形(又称射体,trajector),因而是小句中的参照点。其领地是所在的整个小句,小句中的所有其他名词性词语都处于其领地内(p. 56)。这一参照点概念,大致相当于一些功能主义语言学家(如Chafe, 1994; Halliday, 1994)所说的,小句话题(主位)是小句的出发点。在语篇中,参照点由语篇(或语篇片段)话题承担,其领地是与这个话题相联系的一组小句。话题是认知主体的语境背景知识的核心部分,在语篇处理过程中用于理解其领地中的语言材料(van Hoek, 1997: 54)。

Van Hoek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与Ariel(1990)提出的影响语篇表征可及性的四个因素几乎相同。Ariel(1990)的可及性理论认为,说话者或作者(以下简称说话者)之所以要在语篇中使用不同类型的指称词语,其中一个重要作用便是向听话者或读者(以下简称听话者)标示所指实体的不同可及性

(Accessibility)。因而就指称词语的这一功能来说,它们是可及性标示语(Accessibility Markers)。可及性是一个认知心理学概念,是指人们在语篇产生和理解过程中,从大脑记忆系统中提取某个语言或记忆单位的便捷或难易程度。指称词语表达的可及性是名词短语表达的一种篇章语义属性,是说话者在需要指称某一实体时,通过采用某个指称词语,向听话者所表达的这个指称对象在语篇表征中的可及程度。而听话者则可以根据指称词语表达的指称对象的可及性,在自己大脑储存的语篇表征中找出那个指称对象,从而语篇回指得以确认。

她进一步将可及性标示语分为三大类:1) 专有名词和有一定描述语是低可及性标示语,2) 指示词语是中可及性标示语,3) 代词及其零形式是高可及性标示语。在这几大类指称词语的内部,不同指称词语表达的可及性也略有不同。例如,在指示词语中,远指词(如“那”)比近指词(如“这”)表达的可及性要低一些;代词比其零形式表达的可及性要低一些。她还认为,语言中指称词语的这一特点具有共性。然而,就某种具体语言来说,不同语言中的指称词语表达的可及性可能略有不同。

Ariel 提出的影响语篇表征可及性的四个因素是:1) 间隔距离,即先行语与回指语在语篇中提到的先后间隔距离的远近;2) 竞争度,表现为在回指语前出现、可竞争作为先行语的指称词语的数量多寡;3) 显著性,即作为先行语的指称词语在句子和语篇中的显著度;4) 一致性,即先行语是否与回指语同处于一个相同的认知心理框架/世界/观点/语篇片段或段落中(Ariel, 1990: 28-29)。

而 van Hoek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比 Ariel 的研究进了一

步。她的以参照点和领地为基础的回指规约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在哪个范围内寻找先行语的理论依据和方法。将这个规约机制与 Ariel 的可及性理论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解释语篇中哪些名词性词语可以或通常被理解为某个回指语的先行语,哪些名词性词语在某个范围内不能成为某个回指语的先行语。其基本原则是:如果一个参照点的领地中有一个相应的低可及性标示语,那么这个低可及性标示语不能与参照点同指(p. 4)。例如, van Hoek 认为,在上面例(3)里的四个小句中,如果代词与 John 同指,那么四句句子的合法性可以作如下解释:(3b)和(3d)是两句不合语法的句子,因为两句中的参照点是 he,在参照点 he 的领地内,出现了一个相应的低可及性标示语 John 与其同指。而(3a)和(3c)是合法的句子,因为两句中的参照点是 John,在参照点 John 的领地内,与其同指的两个名词性词语分别是两个高可及性标示语 him 和 his。

诚如 van Hoek 所说,她的回指规约机制可以同时解释句内和句间的回指现象,但她也承认在具体运用时仍有些不同(p. 134)。因为(英语)句内的名词性词语可以根据 Keenan & Comrie(1977)提出的“主语 > 直接宾语 > 间接宾语 > 旁语”的等级阶来确定哪个显著度高,从而将显著度最高的那个确定为句子的参照点。而句间的名词性词语并不构成这种关系,从而必须借助其他一些概念来确定参照点及其领地,如语篇的层级结构、修辞结构、句子之间的连接性、语段的间隔转换等。因此在她的体系中,虽然句内与语篇(句间)的回指确认遵循相同的一套原则,但在具体操作时却要采用两套不同的程序。她也没有具体讨论语篇回指的确认程序,因为她研究的重点是句内回指问题,主要想证明以认知语法为基础的回指解决方案要比生成句法理论优越。

但是,即便是处理句内回指,形式语法中的成分统领和 van Hoek 回指规约机制都有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认定和解释零形代词的回指问题。英、汉两种语言的一个显著差别是,汉语中可以有大量零形回指。那么英语中是否也有零形回指?对于这个问题,在已有的文献中却很少有系统的讨论。许余龙、贺小聃(2007)指出,通常确定汉语句子中是否有一个零形代词的标准是:如果谓词的一个主目位置上没有出现一个显性词语,那么这个位置上应该有一个零形代词。由于汉语“ \emptyset + NP”型句子在译为英语时可以采用“V-ing”分词小句以及介词和形容词等短语,那么在有些英语分词小句和短语前是否也应该认为有一个零形代词?如果是的,那么英语中似乎不仅偶尔会有零形回指,也可以有零形下指。下面是我们英语民间故事语料库中的一个例子,其中第一段中的 \emptyset 下指同一句中的 *six others*,而第二段中的 \emptyset 回指上一段中的 *six others*。

(4) After long consultation, and \emptyset being persuaded by the parson to carry the old woman very quickly into the churchyard, while he walked before, six others made the attempt, and as the parson never ceased to repeat the Lord's Prayer, all went on quietly.

\emptyset Arrived at the church stile, they rested the corpse,
(*Witch of Treva*)

在此基础上,余泽超博士的研究又进了一步。在本书中,他以认知语言学中的可及性理论、象似性及标记理论为依据,自建英汉双语叙事语篇平行语料库,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语篇中的句内下指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系统分析,对英汉下指句式作出了新的认知功能阐释。

其中一个重要的进步之处是,以往的研究通常将“P + NP”看作英语下指的唯一构式, van Hoek (1997) 对“P + NP”构式的研究同样也仅关注如下例(5)中所示的有形代词 him 和名词 Carol's boyfriend 之间的同指关系,忽略了其中的零形代词,并且忽略名词和代词所在小句所表达的事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

(5) Mistaking him_i for a burglar, Barbara shoots Carol's boyfriend_i. (van Hoek, 1997: 121)

根据 van Hoek 的回指规约机制,在(5)中, Barbara 是句中的参照点,处在其领地内的有形代词 him 是一个高可及性标示语,因此不能排除与其同指的可能性。但是由于 Barbara 是一个女性常用的名字,与 him 发生语义冲突,因而不可能同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 van Hoek 的回指规约机制来解释该句中的 him 和 Carol's boyfriend 之间的同指关系的话,那么似乎只能根据“主语 > 直接宾语 > 间接宾语 > 旁语”这个递进阶,选择句中次要显著的 Carol's boyfriend 这个直接宾语作为句子的参照点。但是这样一来,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在该句中会出现参照点的转移。

余泽超博士在本书中则认定,在 mistaking 前有一个零形代词 \emptyset , 整句的结构如下面的(6)所示。

(6) \emptyset_i Mistaking him_i for a burglar, Barbara_i shoots Carol's boyfriend_i.

这样一来,该句中-ing 从句与主句间具有两对同指的名词性词语,即两个下指构式,“ $\emptyset_i + NP_i$ ” (“ $\emptyset_i + Barbara_i$ ”) 和 “ $P_j + NP_j$ ” (“ $him_j + Carol's\ boyfriend_j$ ”), 而不是 van Hoek (1997) 所研究的一个“P + NP”构式。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其中的 \emptyset 和 him 这两个零形和有形代词的指称对象会变得容易确

定多了。这是因为,根据可及性理论,虽然 \emptyset 和 him 都是高可及性标示语,但是 \emptyset 标示的可及性要比 him 高一些,因而其最为可能的指称对象应该是句中最为显著的一个名词性词语,即句中的主语 Barbara。解决了 \emptyset 的指称,也就附带解决了 him 的指称,因为 him 标示的可及性要比 \emptyset 低一些,因而其最为可能的指称对象应该是句中次要显著的一个名词性词语,即句中的直接宾语 Carol's boyfriend。

余泽超博士从认知功能的角度认为,句(6)按时间先后顺序表达了两个相关联的事件。两个事件同时涉及两个话题,其中 Barbara 是主话题,Carol's boyfriend 是次话题。表达两个事件的从句与主句中含有两个平行对称的话题链,其中 $\emptyset_i + NP_i$ 是主话题链, $P_i + NP_i$ 是次话题链。他进一步认为,由于主句在句法结构上比从句重要,因而是句子理解的认知起点,从而根据两个话题链的句法平行对称性,从句中的 \emptyset_j 和 P_j 的指称可以通过主句中的 NP_i 和 NP_j 来确定。

本书对英汉下指句式的认知功能阐释同时关注话题与事件的延续性,并按时间的单向性确定前后景关系。这一阐释符合叙事语篇中语言与现实(句子与事件)的直接对应关系。所采用的名、动两分(话题+事件)的认知分析方法,也有助于对前、后景的功能判断。

下指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而且对于汉语中是否存在真正的下指,学界也有分歧。王灿龙(2006: 23)认为,高原(2003)所说的一些汉语下指句子,其中的人称代词与其后面的名词同指是通过句首的零代词中介而取得的,因而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下指。他的分析有些道理。但是句首的零代词与其后面的名词同指本身也是一种下指,而且许余龙、贺小聃(2007)的研究表明,这是汉语句内下指主要采用的形式。王灿

龙(2006)未能解释为什么这种下指形式在汉语中是允许的。余泽超博士在本书中对此作出了较为明晰的认知功能阐释。这种解释是否合理,请读者判断,同时也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检验。

许余龙

上海外国语大学 语言研究院

2009年12月7日

参考文献:

- [1] Ariel, M. 1990. *Assessing Noun-phrase Antecedents*. London: Routledge.
- [2] Chafe, W.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4] van Hoek, K. 1997. *Anaphora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Keenan, E. L. & B. Comrie. 1977.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and universal grammar. *Linguistic Inquiry* 8, 63-99.
- [6]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7]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8] Reinhart, T. 1999. Anaphora. In Keil, W. ed. *The MIT Encyclopedia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22.
- [9] 高原,2003,从认知角度看英汉句内照应词使用的区别,《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期,189-194页。
- [10] 王灿龙,2006,英汉第三人称代词照应功能的单向性及其相关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17-24页。
- [11] 许余龙、贺小聃,2007,英汉下指的篇章语用功能分析——兼谈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照应的单向性问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6期,417-423页。

Preface

This book originates from my Ph D thesis entitled “Sentential Cataphor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arrative Discourse: A Cognitive-functional Account”, drafted in 2007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ISU).

Cataphora differs from the unmarked form of anaphora in that the pro-form appears before (earlier than/ to the left of) the co-referring expression. This book extends this defini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hierarchic relation between \emptyset , P, and N on the accessibility marking scale, resulting in three patterns: “ $\emptyset + P$ ”, “ $\emptyset + N$ ”, and “P + N”. This treatment of cataphora differs from previous studies in that in the past only the “P + N” pattern was addressed.

The “ $\emptyset + P$ ” and “ $\emptyset + N$ ” patterns (conflated as “ $\emptyset + P/N$ ”) are identified on the basis of a functional/cognitive analysis of the *-ing* headed “P + N” pattern in English. Specifically, argument for shift of attention from “P + N” to “ $\emptyset + P/N$ ” is based on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and assumptions: a) “P + N”, with an explicit subordinator in the P clause, has been sufficiently accounted for in many syntactic/structural analyses; b) van Hoek (1997)’s so-called “cognitive/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s essentially a syntactic one, and her analysis of the \emptyset -headed (V-*ing*) clause in cataphora is largely static because

linear order is employed to analyze “connectivity between nominals” only; c) in establishing “ $\emptyset + N$ ” as an alternative and replacement for the “ $P + N$ ” pattern, we combine “action continuity” (temporal sequence) and “topic continuity” (referential sequence)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V-ing* headed “ $P + N$ ” pattern; d) it helps to establish a common ground, or *TC*, for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languages concerned.

V-ing headed clause in English shares with \emptyset -headed clause in Chinese in that both are used for expressing a perfective iconic event, and as such both can be construed as providing the background for the event(s)/clause(s) that will follow. This assumption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grounding as represented in Li (2004), whose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emptyset -headed clause is based on a somewhat simplistic form-function mapping in the two languages, as is illustrated below.

Chinese: perfective (了) = foreground vs imperfective/durative(着) = background

English: reduced forms (*V-ing*) = background vs full forms (-ed) = foreground

By taking a cognitive-functional perspective and employing the theoretical notions of accessibility, iconicity, and markedness, this book analyzes all the sentences containing cataphora in our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 parallel corpus in terms of both formal “NP + VP” and cognitive-functional “topic + comment/action” configurations, and interpret the cataphoric sentences basically in terms of the semantics of time as reflected in both topic continuity (referential sequence) and action continuity (temporal

sequence). This cognitive-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ntential anaphora in narrative discourse leads us to arrive at a more feasible account of grounding. Since the initial clause in a sentence containing cataphora is oriented by the unidirectionality of time, it reveals a direct mapping between language and the conceptual world.

The author's data analyses show that the ADV/subordination account of the sentence-initial *V-ing* clause is untenable, and the form-function mapping between imperfectivity (着) and backgrounding is far from perfect. We also examine the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topic, aspect, and the use of conjunction within a cataphoric sentenc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narrative discourse.

Focusing on interlingual similarity, the overall tendency shared by the two languages is summarized as "to be iconic is to be econom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anguages lies in the form-function mapping: it is more direct in Chinese and more indirect in English, correlated with and reflected in the more rigid sequence in Chinese and more flexible syntax (morphology) in English.

The conclusions are supported by a self-collected bilingual parallel corpus, totaling 1,100 sets of sentences. For SL Chinese, the author relies mainly on two novels: *Camel* and *Midnight*; for SL English, he resorts solely to the narrative, with *Sister Carrie* as the big piece and numerous other short stories as supplement. This is more consistent than previous practices, most of which employ isolated sentences.

This book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support and efforts of numerous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First of all, I owe many debts of gratitude to my Ph D thesis supervisor, Professor Xu Yulong, for leading me into the areas of discourse analysis, anaphora and cataphora, and for supervising my graduate studies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ISU). I benefited immensely from his insightful comments and valuable guidance. With extensive and profound knowledge in linguistics, he is my role model of academic research.

I wish to thank the professors at SISU,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f. He Zhaoxiong, Prof. Mei Deming, Prof. Shu Dingfang, and Prof. Yu Dongming, from whose illuminating lectures and seminars I benefited greatly. My heartfelt thanks also go to Prof. Hong Gang, Mr. Zheng Lianzhong, Dr. Louis Mangione, and Dr. Xu Jiujiu, all of whom have been of great help one way or another.

I appreciate the team spirits and friendship of my fellow candidates, Ai Lin, Xiong Qianli, Yang Chunlei, and Gao Wencheng, to mention only a few. I thank my wife Hongyan and my daughter Qianqian, who never failed to be a source of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although occasionally both wondered if I really needed that much time to draft and polish this little book.

Last but not least, my gratitude to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Office fo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r their generous grant.

